

林洙 著

——中國營造學社史略

叩開魯班的大門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叩開魯班的大門

——中國營造學社史略

林 洙 著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5 號

叩開魯班的大門

——中國營造學社史略

林 洙 著

*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發行（北京西郊百萬莊）

新 華 書 店 經 銷

北京二二〇七印刷廠印刷

*

開本：850×1168 毫米 1/16 印張：10 字數：215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一版 199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 1300 冊 定價：26 元

ISBN7-112-02619-9

TU·1993 (7708)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可寄本社退換

（郵政編碼 100037）

序

汪 坦

讀了林洙關於朱啓鈴先生與中國營造學社的述作，感觸萬分。我生年較晚，未及見桂辛先生，然而學社初期卓越成就早已深銘心中。中央大學同學鄭孝登、朱暢中先後獲得桂辛獎學金，我等遂亦略知桂老事蹟。學社學術帶頭人梁思成、劉敦楨先生更爲青年學人所敬仰。桂老與中國營造學社於中國古代建築研究之功績，永垂後世，不可磨滅。在此之前，言及我國宋以前實例，必以日本唐招提寺金堂和法隆寺五重塔爲例，其精美絕倫令人神魂繫之，然而不禁隨之悵然！這種遺憾，終於由前人艱苦引路，後輩奮發圖強而告結束，今日已碩果累累，矗立於世，不無揚眉吐氣之感！

這是來之不易的，其中甘苦很少被人稱道。林洙以其多年對此熱誠關注，閱讀文獻，走訪故老，摘錄梁、劉的手記，讓當時情景得約略於眼前，使這種一絲不苟、鍥而不舍的精神也能爲後來學人所繼承。這是我敢於不避非分之嫌，爲此作序的緣由。

桂老發揚我國傳統文化宿志，可以說不論處境如何，始終是勇往直前的。1949年前，梁、劉輾轉南北，形容他們爲學術研究而致“顛沛流離”，也不算過分。一時連編制都要算作屬歷史語言研究所以維持工作，調查考察時，宿在大廟中，凍得用報紙夾在毛毯間取暖，飽受跳蚤臭蟲之苦就不用說了。提及這些情景，我非常激動。當然，不是以跳蚤臭蟲爲榮，也不是一定要以苦爲樂，而且今後這些可能不復存在了。但是，下鄉伊始，先問食宿待遇，一餐飯要吃二小時以上，至於偷換弄巧，坐待天賜，製造精神上的偽劣商品，不是也時有所傳嘛！謙虛既不是美德，打腫臉充胖子也不值得推廣。相比之下，還是宣揚一下艱苦奮鬥精神爲是。希望林洙這本書能受到重視，廣爲流傳。不要讓“知識產權”旁落，弄得回到學社問世以前的狀況，這是決不能容忍的！

1995年2月於清華大學

前言

50年代初，我剛到清華大學建築系工作時，分配到《中國建築史》編纂小組繪圖。每天接觸的全是中國營造學社當年調研測繪的測稿、圖紙及大量的照片。學社那些精確的測稿和科學嚴謹又富有藝術性的測繪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0年動亂期間，學社的這些資料被視作“封、資、修”毒草，有相當一部分被毀棄了，如樣式雷（雷發達家族）的燙樣（模型）及明器等。至於學社保存在清華大學的文書檔案和梁思成的測繪筆記也都視為“毒草”被斬草除根了。

1989～1990年間，我為寫《大匠的困惑》一書需要瞭解梁思成在學社的活動，翻閱了學社殘存的資料，但因該書要趕在梁思成誕辰90周年前夕出版，很多問題沒能深入研究就放下了。

但是，學社的工作在我腦中留下了許多問題。它80多位社員，我知道的僅有五分之一，其他五分之四都是些甚麼人？為甚麼吸收了那麼多非建築界人士入社？為甚麼這僅有10多人的研究隊伍能在短期內完成那麼大量的工作？如此豐碩的成果是怎麼取得的？他們到底調查了哪些省、市、縣？調查測繪了多少座古建築？他們的工作是怎樣組織的？等等一連串的問題，不得其解。

到了1992年，我產生了對中國營造學社的業績做全面的瞭解並把它寫出來的願望。恰巧，這時《建築師》雜誌主編楊永生約我為該刊寫些關於營造學社活動的文章。於是，我開始搜集資料，並通讀了《梁思成文集》、《劉敦楨文集》和《中國營造學社叢刊》。對其中重要的資料做了系統的摘錄和整理。至於社員的情況和朱啓鈴的資料，則是從其他書刊中查到的。為此，前後加起來大約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坐在圖書館裏查找資料。

從1992年初到1994年底，用了整整三年時間，總算把中國營造學社從成立到結束的全過程基本搞清楚了。但是，因為梁思成、劉敦楨都已經作古，尚健在的幾位學社元老也都是70開外的老人，許多事也難於要求他們記得那麼清楚。學社的文書檔案也沒有保存下來。所以，盡管我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這書的不足和疏漏，在所難免。比如，書中對調查地點和建築數量的統計，肯定尚有遺漏。我依據的是梁、劉文集和叢刊的記錄，凡是未見諸文字記錄的均未計入。如在學社的圖註中見到梁思成測繪邢臺天寧寺塔及梁、劉二人測繪北平正覺寺金剛寶座塔的照片。但在梁、劉二人的文集和叢刊中均未見記述。梁、劉二人生前都提到經學社調查過的縣有200多個，但有文字記錄的僅有190個縣。

書中所示學社調查過的市、縣及古建築，是根據梁、劉文集和叢刊公佈的材料，逐項統計出來的。調查路線也是根據他們的調查報告和日記繪製的。其中晉汾地區的調查路線，還是根據費慰梅（美國費正清夫人，Wilma Fairbank）61年前給她家人的信，

整理出來的。至於書內選用的照片，因底片均遭水殘，故雖做了極大的努力，質量仍不够理想。再者，由於過去照相器材缺乏，學社有一條紀律：不允許拍攝個人紀念照，有人物的照片也多半是以人作為標尺而攝的，往往只是人的背面。特別是梁、劉二位經常擔任攝影師的角色，因而他們的照片特別少。書中選用的幾張測稿，因原圖經水殘已呈黃灰色，且滿布皸紋，但我仍舍不得放棄，經胡慶章反復試驗，才得到現在的效果，只好略選幾張，以饜讀者。

我想，有一點是可以使讀者放心的，即書中涉及到的事實，都是經過反復核實的。對有關古建築的評介也都源於梁、劉二位的原著，不敢妄加評論。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得到朱海北、朱文樞、劉致平、莫宗江、陳明達、單士元、羅哲文以及臺灣的李乾朗、日本的佐藤重夫等各位先生的幫助。特別是莫宗江先生多次為我講述學社的工作情況。汪坦教授為我審閱了全文，並為本書作序。這些使我極為感動，在此對老前輩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誠摯的謝意。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秦佑國教授，是本書有力的支持者，並為“營造學社研究”課題撥出經費。

我院資料室李春梅、鄭竹茵兩位女士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時間為文稿打字。大量的照片翻拍放大工作，都是胡慶章、劉為民兩位同仁協助做的，在此一並致謝。

本書能順利出版，要感謝臺灣趙立國先生、美國費慰梅女士和清華大學建築學院，他們對此書出版給予了大力贊助。

本書稿殺青後先給楊永生看過，他認為篇幅較大，還是出一本專著為好。應該說，他是這本書最早的一位支持者，並為本書的編輯出版做了種種努力，我要感謝他。

最後，還要感謝我的女兒林彤，不少難覓的參考書都是她為我查找到的。

林 洙

1995年元宵節於清華園



林洙，著名建築師梁思成的遺孀，1928年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1953年入清華大學梁思成主持的中國建築史編纂小組工作，長期任建築系資料室主任。1962年與梁思成結婚，十年動亂中與梁共同度過了苦難的歲月，給梁以極大的精神安慰。

梁思成去世後，她整理梁的遺作，編輯了《梁思成文集》，並寫了大量回憶紀念梁思成的文章。其中《大匠的困惑》一書，於1990年在大陸與臺灣同時出版。為紀念梁思成誕辰95周年及清華大學建築系創辦50周年，她又寫了本書。此外，還寫了《建築師梁思成》，編輯了《梁思成建築畫集》，這兩本書將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

責任編輯：楊永生

目 錄

序	汪 坦
前言	林 洙
一、中國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啓鈴	1
二、中國營造學社機構及職員	19
三、中國營造學社經費來源	37
四、《營造法式》編修及版本	40
五、開拓中國建築史研究的道路	52
六、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就及影響	124
附錄一 中國營造學社社員簡介	129
附錄二 中國營造學社出版物目錄	146

一、中國營造學社創始人——朱啓鈴

(1872~1964)

朱啓鈴，貴州開陽人，字桂辛，晚年號獲公，人們稱他桂老，1872年生於河南信陽，1964年卒於北京，享年92歲，幾乎長達一個世紀。他的一生經歷了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民國、日偽、新中國五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正是中華民族從苦難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進入大變動的時代，在長達近一個世紀劇烈變動的近代中國社會中，要想出污泥而不染絕非易事。所以，對朱啓鈴這個歷史人物的研究不能把他限制在一個簡單而僵化的模式裏。而要把他置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來評介；過去，人們往往簡單地把朱視為“政客”，但他一生的活動絕不局限於政治方面，他是一個傑出的實業家、古建築專家、文物收藏家，並對髹漆、絲織等做過深入的研究，達到很高的學術水平。他是一個多重性的人物，所以對他的研究，必須注意到他所處的不同的歷史時期，及他本人的多重性。也就是近代史家稱之為“方面論”及“階段論”的觀點。只有從這縱橫兩方面去觀察他，才能通觀他的全貌。我對朱啓鈴先生知之甚少，感謝朱海北先生、朱文樞先生對我的熱情支持，使我得到了不少寶貴的資料。遺憾的是朱本人留下的文字材料太少，限於時間和精力不可能查閱更多的史料。對朱啓鈴先生更深入的研究尚有待後人去完成。

朱啓鈴早年喪父，隨母寄居在外祖父家，八歲開始讀書。1884年朱的姨夫瞿鴻機（註1）視學浙江，朱隨母携妹至杭州探望姨母，住在杭州學使署。瞿見朱聰明過人，特延聘名師張石琴先生教朱習制舉文，經一年多的學習，朱於舉業無所成就，卻對當時的新學產生濃厚的興趣。瞿經過年餘的觀察，發覺朱是個經世之才，難望以科舉進身。果然，朱啓鈴很早就顯示出了他的辦事才能，15歲時，就能幫助辦理外祖父的喪事。

1889年朱17歲時與陳崧生（普國藩次婿）的過繼女陳光璣成婚。婚後自立門戶定居長沙定王臺。陳崧生出任英法比參贊時，陳光璣隨父出國，生活在巴黎，10歲後才回國。陳給朱帶來了不少異國見聞。朱啓鈴終身堅持一夫一妻，沒有納妾。他的子女們（特別是女兒）可以自由參加社交活動。這在當時還沒有完全擺脫封建禮教影響的社會來說，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也可以說，他較早就從陳光璣那裏接受了西方社會文明的思想。

1891~1893年瞿鴻機赴四川典試，朱亦隨侍左右。四川幅員廣闊，學政每年兩度科試，瞿需親往各縣典試，旅途又辛苦又驚險，朱乘馬隨從，調護瞿的起居。瞿亦注意對朱的培養，並每在他批閱案卷時，囑朱在側學習，曉以史乘掌故，並令朱試着批復案卷，感到他的批復頗有見地亦中肯。



1906年朱啓鈴任京師內城巡警廳廳丞

這一時期，朱結交不少賢俊，一起談論天下大事。其中尤以同幕唐才常最是知交。朱的岳父留給他不少駐外時的雜記書籍，朱從這些讀物中得出“西人以製造致富”的經驗總結。因而認為中國也應走“以製造致富”這條路，可以說朱很早就樹立了後來諸多愛國志士上提倡的“實業救國”，“工業救國”的思想。他與唐才常經常談論，深感中國只有走這條路才能“強國富民”。直到1898年戊戌政變失敗。朱又佐瞿鴻機督學江蘇時，還常與張弼希、楊篤生、章士釗等私購變法維新書籍，互相傳習。可以說，朱的一生始終抱着實業救國的信念。不管他是短暫的擔任蒙務局督辦，或任京師巡警廳廳丞，或任交通部總長，或任內務部總長，直到任中興煤礦總經理，他都沒有放棄辦實事、發展工業、強

國富民的信念。

瞿鴻機通過在四川兩年多對朱的考察，認為朱有非凡的辦事才能，雖難從科舉進身，但若登仕途，不難自發。因此，在1893年瞿離四川之時，出資為朱捐了一個小官。

1894年朱到瀘州鹽務局印簽所任職，他的家屬也遷居瀘州。

1896年朱調管灌口水車兼救生紅船事。後又調專管雲陽大湯子新灘工事，這是他接觸的第一個工程。1897年雲陽工地失火，他住的草屋燒毀，但他幸免於難。工程竣工回到家中，不久夫人陳光瓚病故。由於朱在工地曾遭火災，妻子也病故瀘州，因此朱的母親不願再留居四川，於是東歸。是年秋，朱取續室於寶珊夫人。

1898年瞿鴻機按試蘇松、太倉地區，朱又隨侍左右，並隨瞿進京，被朝廷引見，分發他到江蘇任職，家屬也遷到蘇州。

1899年朱在上海出口捐局任職，又合家遷居上海。

1900年義和團起義。朱母傅太夫人病故，朱奉母靈柩回長沙。1901年在長沙守喪。

1902年朱送姨母（瞿鴻機夫人）入京，這時瞿已官到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兼政務部大臣，後又任外務部尚書，地位顯赫。瞿留他在京。

1902年由瞿推薦入路礦總局任職。不久奉張文達派任譯學館提調。

1903年升譯學館監督，於是全家遷來北京。

1904年經徐世昌介紹朱與袁世凱相識，議後即辭去譯學館職，候政北洋。

1905年朱赴津主持天津習藝所工程。

1905年革命黨人吳樞在北京正陽門車站用炸彈轟炸出洋考察的五大臣，清庭大為震驚，袁世凱乘機插手北京警政，奏請設巡警部，1906年巡警部設立，經袁保薦徐世昌任尚書，趙秉鈞為右侍郎，毓郎為左侍郎。改組北京巡警機構，朱任京師內城巡警

廳廳丞，後又調外城巡警廳廳丞，創辦京師警察市政。

當時巡警制度，在國內尚無先例，創業艱難，從體制到各項條例的制定，均由朱親自擬定。為首都的治安，他每天騎馬巡視京師內外，當時市政也歸巡警廳管理，他開始注意北京的街衢市容。這為他日後任內務總長時，著手北京的市政建設打下了基礎。同時朱創始的巡警制度也被日後全國各省市成立巡警警察機構時，奉為主臬。

1907年瞿鴻禨被清廷罷相歸裏，朱亦自請開缺，居長沙一年。

1908年袁推薦徐世昌任東三省總督，徐奏調朱任蒙務局督辦。朱在上任之前先赴日本考察殖民政策，次年回國深入蒙區調查，看到興安嶺以南（註2）地區資源豐富尚未開發，因而擬定“籌蒙要策”，計劃移民邊區，開發地區資源，發展邊區城鎮，想使人烟稀少的邊區得以繁榮。經濟發展了，可由地方撥款供邊防軍的軍費，從而鞏固邊疆，加強國防。計劃中列舉應辦之事20餘項，並附金融機關之組織及局務籌款辦法。可惜，這項計劃未能實行。1909年袁世凱被攝政王罷官，徐世昌亦調離東三省改任郵傳部尚書。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封建社會，朱自然也被迫辭去蒙務局職。

1910年朱到徐世昌主管的郵傳部任丞參，兼任津浦鐵路北段總辦，籌建山東濰口黃河橋工程。

山東濰口大橋工程，在當年是一件大事，黃河下游河床淤積了很厚的沙礫層。橋墩基礎必須採用沉箱法施工。這種技術當時在國內尚屬最新技術，朱對這一工程自勘察設計直至施工，事無巨細，均一一親自過問。橋墩基礎施工時他親自下到沉井中去視察上層情況，沉井中氧氣不足，十分憋悶，上得岸來正在喘氣，有人從旁呈上一封電報，原來是家中來電報喜，長孫朱文極降生了。

1911年袁世凱東山再起，1911~1912年朱任京浦鐵路督辦。

1912年袁就任臨時大總統後不久即任朱為交通部總長。朱鈐鈐自1910年任郵傳部丞參，至1912年任交通部總長。於1915年在內務總長任內又兼了一任交通總長。前後涉足鐵道事業約五、六年的時間，成為老交通系的重要成員之一。交通系，是北洋軍閥治下，政府中的一個重要政治派系。它雖不是公開的政黨，卻具有左右政局的勢力。交通系之所以能成為一派政治力量，是因為它把持全國的路權，掌管全國路、電、郵、航四政。並設有交通銀行，管理四政專款及全國匯兌，握有一定的財權。其中又以路權最為重要。民國初年京漢、京奉、津浦三路開始運營，獲利較多。鐵路收入亦多流用軍費、政費。同時有了路權便可以鐵路為抵押向外國大量貸款，以解決政府財政困難。北洋政府就是因為它控制住交通系，從而絕大部分經費由此而來。1912年交通銀行逐步擴展，取得國家銀行的地位，交通系進而染指國家財政，呼風喚雨，左右政壇。老交通系的領袖人物有梁士詒、葉恭綽，前者總攬交行金融，後者總攬路政。任過交通銀行的總經理及董事的有：梁士詒、曹汝霖、張蔭桓、周自齊、朱鈐鈐、陸宗輿、葉恭綽、徐世昌、汪有齡、周作民、蔣邦彥、孟錫珏、任鳳苞、施肇基、方仁元、錢永銘等。這些人均與朱有交往，其中梁士詒、葉恭綽、徐世昌、周作民、孟錫珏、任鳳苞、錢永銘等後來都是學社社員，並為學社研究經費或解囊或奔走。其中尤以葉恭綽與朱關係最為深摯。

朱任交通總長時期，除已建成的京廣、京奉、津浦三綫外。從全局考慮計劃再修築四條主幹綫以貫通全國。(一)寧湘綫，自南京至長沙並延伸至貴陽。(二)同成綫自大同到成都，使四川豐富的物資得由陸路運出，避開三峽之險。(三)浦信綫自浦口至信陽。(四)隴海綫自東海至蘭州。朱計劃的這四條綫是很有眼光的，也是他實現“實業救國”的基礎建設。但是腐敗的北洋政府，將大量的鐵路經費用於軍、政。這個龐大的修路計劃，僅隴海綫東段開工，其它均未實施。同成綫自寶雞到成都段直到50年代才修成。

1913~1916年袁世凱任大總統職，任朱啓鈴為內務部總長，1916年袁世凱稱帝失敗，六月病逝，朱亦引咎去職，移居天津。

從1906~1916朱跟隨徐世昌、袁世凱10年，也即是朱被後人詬病的一段歷史。因此，我們也不能不認真的來對待朱的這一段歷史。朱的親友們出於對他的愛護，亦常為他開脫。如葉恭綽曾說：“袁用他，實際是把他當作瞿的人質”，朱的秘書劉宗漢先生也認為“袁對他終究是有芥蒂的，在任用中又有時把他放在最容易受傷害的地位。……如果討袁軍勝利，他自然便成禍首，而袁的嫡係親信都得到保護。”(註3)按這個說法似乎認為袁之用他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嫡係。筆者認為以上兩種說法均有欠妥之處。

本世紀初，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集團已基本形成。當時任軍機大臣的瞿鴻禨與袁的矛盾也逐步深化。清廷實際掌握軍權的榮祿已被袁世凱以拜為門生等各種手段拉攏過去結為死黨。袁想如法炮製拉攏瞿，先示意願列為瞿的門生，被瞿以萬不敢當卻之。繼之，又託人詢問可否換帖，結為兄弟，瞿又婉言辭謝。袁意識到瞿不可能被他收買，因此立即警告他的死黨奕劻必須把瞿趕出軍機處。否則，“日後必受其害”。1907年趙啓霖參奏載振，奕劻受賄且事，舉朝嘩然，西太后大怒，下令查辦。載、奕被袁設法包庇過關。趙啓霖是軍機大臣瞿的同鄉，袁認為趙的參奏是受瞿的指使。因而參案一結束，袁立刻發起反擊，以一萬八千兩銀子收買御使俾毓鼎，要他參劾誣陷瞿“暗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分布黨羽。”清廷遂將瞿開缺，至此瞿袁之爭，以瞿鴻禨的徹底失敗而告終。

後人根據瞿罷相後，朱亦自請開缺為由，認為朱是瞿黨無疑。在瞿倒臺後，朱為瞿的政敵服務，有所非議。但筆者卻有些不大成熟的看法，僅供參考。

(一)朱不是瞿黨，至少不是瞿的死黨。盡管朱在青年時期(20歲)就追隨瞿的左右，但瞿始終沒有重用他，一直就是個小官，直到1903年(朱30歲)由張文達之薦當了譯學館的提調，轉年升監督。名聲雖好聽，但譯學館是個沒有政權、財權、軍權的清水衙門。這個差事遠遠涉及不到瞿袁的政爭，盡管朱曾為瞿傳遞過文件，也僅僅是因為他和瞿有親戚關係而已。有人根據瞿罷相後，朱自請開缺為由，認定朱是瞿的人，這個理由也是不充足的。在封建社會，僅僅因為是同鄉，親戚而受株連是常見的人，朱當時任京師巡警廳廳丞，這麼重要的職務很可能被清廷視為瞿“陰結外援”的一份子，因而他自請開缺，這只能說明朱是很有頭腦的聰明人。盡管瞿朱在政治上沒有很深的瓜葛，但瞿畢竟是最早提拔他的人，因而朱在瞿失敗後，暫時退出政壇，這也是合乎情理的。

認為袁用朱是把朱當作傭的人質的說法，更是沒有充分的根據，因為朱並非瞿的子或孫，也不是養子，從《朱啓鈴自撰年譜》來看，朱瞿的關係與感情並沒有深到能當傭的人質的地位。

(二)對袁世凱為人的陰險毒辣，及政治上的卑鄙詭詐，是隨着歷史的發展進程而逐漸被人們認識的，特別是他直接指使的幾起重大謀殺案，只有在死後才可能被徹底揭露。

我們且看看本世紀初袁世凱的表現。他編練北洋新軍，被譽為懂得現代兵法的軍事家。政治上他投機立憲，以“開通風氣”自詡，連上奏折，修談立憲，1907年立憲運動達到高潮，他也成為立憲“急進派”，被視為憲政運動的中堅。他還力主新學，聯合張之洞兩次上書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在他管轄的直隸，幾年之內就辦了高等學堂5所，中、初等專業學堂及習藝所133所，中學及女子學堂67所，小學校4344所。“凡已見冊報者人學人數共86652人”(註4)他還令周學熙辦理實業，先後在天津創設鐵工廠、考工廠、商品陳列所、國貨售品所、種植園，並在各縣辦工廠分廠，設直隸工藝局。1906年又開辦灤州煤礦公司，擴大唐山啟新洋灰公司等。(註5)袁的這些赫赫政績，不僅外國人對他“刮目相看”，甚至相當多的革命黨人，包括孫中山也被他所蒙蔽。瞿袁相比，自然袁比瞿更能討好世人，更能吸引朱啓鈴這個胸有大志，要想幹出一番事業的年輕人，並與朱的“以製造致富”的想法相一致。

(三)袁世凱是個重才、識才，且會用才的人。在徐世昌把朱推薦給袁時，袁肯定已通過他的情報網對朱進行調查，並已對他有個基本的估計。否則，袁不可能僅僅為了表現自己的“雍容大度”而重用他。1904年冬徐正式向袁引見了朱，這次見面雙方進行了深入的交談，並互相賞識。這在1936年朱寫的《朱啓鈴自撰年譜》中可以看到。1936年袁已去世20年，按說朱對袁已無任何顧忌，但朱仍在年譜中寫上“光緒三十年……冬以天津徐公之薦，受項城袁公知”。這裏朱用了一個“知”字，這就說明了朱袁會晤的性質，及對朱的重要性。這一個“知”字也概括了朱與袁的全部關係，就在朱袁見面之後，朱辭去譯學館職，以“候政北洋”。於次年赴天津主持習藝所工程。實際上習藝所工程，只是一個暫安之處，袁是準備重用他的。果然於1906年機會來了，徐世昌出任巡警部尚書後，朱即升任京師巡警廳廳丞。至於袁對朱是否存在芥蒂呢？可以說袁對他手下的人，個個都存有戒心。

袁世凱為了鞏固自己的獨裁統治地位，在政府部門盡可能安插他的親信、嫡係。在他任大總統及臨時總統期間，國務總理一直由他的親信擔任，如唐紹儀、陸徵祥、趙秉鈞、段祺瑞、熊希齡、徐世昌等。各任部長也都是他的嫡係，僅僅為了同革命黨人妥協，他才把一些次要的部門讓給同盟會會員和進步黨人，如梁啟超一度任司法總長，宋教仁任農林部總長，蔡元培任教育部總長等。其他如財政、交通、軍隊這些要害部門的大權袁是緊緊抓住不放的。對他的下屬也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嫁禍於人，更不可能去“保護”他們。

袁內閣第一任總理是唐紹儀，唐本是袁的親信，辛亥革命後加入了同盟會，以“調和南北”自居，在任總理期間，推行責任內閣制，為袁所忌，當年就被迫辭職。代

之以表面上無黨派的陸徵祥。陸不久就被趙秉鈞接替。趙秉鈞是袁一手提拔的人，對袁感激涕零，死心塌地地為袁賣命，1913年趙因參與謀殺宋教仁案被迫調離。1914年趙對袁派人刺死殺害宋的案犯應夔丞有不滿情緒，袁得知後立刻派人將趙毒死滅口。任袁總統府秘書長的梁士貽，也是袁的心腹，且利用他任財政部次長及交通銀行總經理的職務，為袁籌措大量活動經費，深得袁的依賴，人稱他是袁的“財神”。但是梁好包攬把持，利用秘書長職權，在北洋政界培植個人勢力，形成頗有影響的交通系，又為袁所忌，袁遂下決心把他撤出總統府，派為稅務處督辦。

可以說，袁在任臨時總統期間唯一沒有委以重任的人就是袁的結拜兄弟徐世昌，但這決不是袁對徐的保護，而是徐的老奸巨滑。袁當選為臨時總統時曾請徐世昌相助一臂之力。但徐看到當時黨派林立，各派政治力量爭奪複雜，不願出頭，想等待一個比較適當的時機，所以表示，現在出仕，愧對清室，所約以二年後出山。1913年7月袁又想請徐當總理，接替趙秉鈞，徐以時機未到仍不肯出。因此，袁委朱啟鈐代理了很短的幾天總理，即請段祺瑞接替趙秉鈞。但部分進步黨黨員提出要彈劾內閣，袁才被迫改組內閣，經過多次磋商，袁同意由熊希齡組閣。因熊同各黨派素有關係，可減少各方面的反對，以達到袁能盡快坐上總統寶座的目的。而內閣人選實際上袁只留下司法、工商、教育三個部，供熊支配。

到了1914年袁當上正式大總統後便賜開熊希齡。請徐世昌出任國務卿，徐也就受命了。到1915年當帝制開始發動之時徐窺測出可能引起政局動蕩，又以不使“親厚悉入局中”，以備將來“謀轉圜”為托詞，堅決辭去國務卿職務。到洪憲退位後徐才又復出任了一個月的國務卿。

由此可見，所謂“人質”論，及袁用朱是為了保護他自己的嫡係這兩種說法都站不住腳。筆者認為，從1906～1913年，國民黨“二次革命”以前，袁的反動面目尚未充分暴露，儼然是一個推行立憲“新政”，贊成共和的人。在他取得臨時大總統的職位後也一再表示：“永遠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尊孫中山和黃興二人為“革命元勛”。孫、黃也落入袁的圈套，表示對袁信任。孫中山亦曾表示“無論如何不失信於袁總統，且他人皆謂袁不可靠，我則以為可靠，必欲一試吾目光。”（註6）。

因此，筆者認為當時朱忠於袁是無可非議的。不能用現在我們對袁世凱的認識去要求本世紀初的朱啟鈐。

但是在“二次革命”後袁的反動本質逐步暴露，特別是謀殺革命黨人宋教仁，與日帝簽訂21條不平等條約，及恢復帝制，可以說是激起全民公憤，成為全國共株之，全民共討之的對象。而朱也恰恰是在袁所執行的獨裁政治中，越陷越深不可自拔，最後成為袁稱帝的十三太保之一。過去人們往往認為朱僅僅為袁稱帝籌備大典做了些事務性的工作。但如果深入的閱讀一些史料，就知道朱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帝制的策劃。葉恭綽說他不願為自己洗刷，其實他也没甚麼可洗刷的，因為他的確參與了復辟帝制的部分陰謀活動（註7）。鑒於朱本人沒有留下這方面的文字材料，因此我們也不宜妄加評論，強加於人。

但袁世凱畢竟是第一個認識朱的才能，並敢於重用他的人。張明義先生說朱不能排除“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觀念，從朱的《自撰年譜》來看，這個解釋是合乎情理的。在朱長達 92 年的生涯中，這不能不是一個小小的遺憾。

盡管朱管鈴僅任了三年為務總長，因他同時督辦京師市政，在他任職期間卻辦了一系列造福北京市民的大事。

改建正陽門，打通東西長安街 開放南北長街、南北池子，修築環城鐵路

朱在清末任內外城巡警廳廳丞時，就經口騎馬巡視京城內外，對京城的大街小巷、交通情況、建築狀況無一不瞭如指掌。他上任任務總長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實現他考慮已久的正陽門改造計劃。現在的前門與正陽門之間原被東西舊城所封閉，出入城門須穿過甕城門洞再經正陽門門洞。而恰在正陽門外即是京奉、京漢兩條鐵路幹線的終點，因而交通壅塞日趨嚴重。朱提出拆去甕城，保留箭樓，在正陽門城牆兩側各開兩個門洞，以使交通疏暢。這個計劃在當時是一項很大的工程。甕城拆下的大量磚土如何運出城去，人力來源，經費問題等等都是需要一一加以統籌解決的難題。當時北洋政府財政短絀，根本沒有能力辦這樣一件大事。因為朱擔任過交通總長，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將正陽門在改建後，對京奉、京漢兩路局將得到的便利與利益說服兩路局局長，促使兩路局出經費，出車皮支持正陽門改建工程。又因他與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江朝宗、李長泰等人捻熟，所以又動用了部分工兵解決人力的不足。

現在前門箭樓北面的月臺及箭樓周腰挑出的平臺和欄杆便是當時加建的。月臺是利用甕城拆下的舊磚築成的，既節約了材料，又與箭樓在外觀上取得統一色調。甕城拆下的渣土由京漢、京奉兩路將路軌直接鋪到東西甕城腳下，將渣土直接裝上車皮運走。怎樣才能盡快地在門前這一交通繁忙的地區竣工，朱均一一經過周密的考慮運籌規劃。接着他又開放打通東西長安街、南北長街、南北池子，以便市民。他還修築了環城鐵路，解決東西南北城之間貨運的困難。除了這些工程本身的困難外，在朱提出改建正陽門計劃之初，京城幾乎嘩然，認為此舉將破壞京城風水。反對之聲此起彼落，但朱有這個膽略，逆輿論而行，終於成功。當年，袁世凱為了表示對朱的支持，還特製一把銀鎚，上鑄“內務部朱總長管鈴奉大總統命令修改正陽門，朱總長愛於一千九百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朱於開工典禮日即用此鎚拆去舊城第一磚。後來朱一直珍藏着這把銀鎚，朱去世後由他的兒子朱海北先生，將這把紀念鎚贈給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現在珍藏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



1915年北京正陽門改建工程開工典禮



正陽門 1915 年改建前全景

綠化市區，疏浚護城河

中國的傳統城市，在街道衕巷中沒有綠化，植樹都在院內。就像故宮，偌大一個宮殿，只有少數花園，再就是大內各宮，庭院中的兩三棵樹與盆花。朱任內務總長時即著手城市綠化，在主要街道兩旁種植槐樹，在護城河兩岸植柳，疏浚護城河，從而美化淨化了首都的環境。道旁綠化，這本是發達國家極平常的市政設施。但在民國初年的中國卻是開風氣之先。可貴的是朱在這一系列工程設施中，運籌募化，以極少的經費辦成這兩項浩大的工程。

創辦北京市的第一個公園

故宮西南的社稷壇為明代所建，清緣之。但清末民初已荒蕪得很利害，園中雜草叢生，灌木均有一人多高。明清以來，北京城始終沒有供市民遊息的綠地。朱決定將社稷壇改建成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在改建正陽門時，因天安門廣場兩側的千步廊早已坍塌，遂決定拆除千步廊，將拆下的木料用來建園。今日中山公園中的來今雨軒、投壺亭、繪影樓、春明館、上林春一帶廊舍，東西長廊等等均是利用千步廊拆下的材料建造的。原有的社稷壇、祭殿、庖廚等均保護下來，並有機地規劃組織到公園裏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園內古樹很多，多植於金、元、明，朱對這些樹視若珍寶，對古樹的株數，樹徑大小一一如數家珍。在施工過程中，他又諄諄叮囑工匠，注意保護古樹。因而，整個施工過程沒有毀壞一株古樹。朱把古樹視為國家文物來加以保護。

當時，北洋政府根本沒有財政力量來建園。因為朱啓鈴很好的利用了千步廊拆下的木料，同時利用他任內務總長的地位，調動了工兵來清理園中的雜草並拆運千步廊木料。這就節省下了一大筆開支，但建園經費仍是個大問題。朱組建公園董事會，通過募捐來解決（註8）。就是這樣一件造福於民的好事也是阻力重重。後來朱回憶說“乃時論不察，皆為之懷古制侵官物者有之，好土木恣娛樂者有之，謗言四出，繼以彈章，甚至為風水之說，聳動道路聽聞，百堵待舉而阻議橫生”。朱啓鈴強烈的感到“所事皆屬新政，建設之物，無程序可循，昕昕擘畫，思慮焦苦，……”。（註9）。

自民國三年（1914）公園董事會成立，至民國四年，共籌集了63060元。捐款在一千元以上的有：徐世昌、張勳、雍濤三人，各1500元；黎元洪、朱啓鈴、周自齊、楊度、楊德森各1000元；機關有陸軍部、海軍部、內務部、財政部、交通部、中國銀行、外交部各1000元；捐款在500元以上的有胡筆江、鄧文藻、王克敏、張弧、梁士詒、段芝貴、徐樹錚，機關有司法部、參謀部、稅務處各500元。其次則200元，100元不等，最低額為50元。捐款總人數達300餘人。成立了中央公園管理董事會，並選出常務董事會辦理日常事務。董事會自成立後即成為一個熱心為公眾利益的自治團體。董事會成員既出錢，又出力，為公不為私。全體成員一律照章辦事，交納會費。常委們對內一致努力，對外一切公開，公園管理得到了全社會的支持，公園設施日趨完善，從未遭到破壞，直至由政府接管公園，可見北京市民對公園的愛護。

中央公園管理董事會，是本世紀初在我國出現的十分有效的社會自治公益團體，它的某些做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鑒價值。從以上幾件事中，我們看出，朱啓鈴是一位很有眼光，很有魄力的熱心公益的事業家。